

17.8.1/50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六至九辑合订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六月

封面题字 沈 岑
封面设计 周宜遒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六至九辑合订本

(内部发行)

内字第74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印数：1—4,000 字数：324,000

工本费：2.20元

再 版 说 明

本选辑原一至九辑因已无存书，应有关方面和史学研究工作者的要求，现以合订本形式分为两册重印，内部发行。

这次再版时，我们除了把不属于本省的史料及一些转载文稿作了删减外，其余内容及文字仍保持原样，未作改动。

一九八五年四月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〇年六月

目 录

热爱青海 建设青海	廖汉生 (1)
重团结, 讲政策, 深深扎根于群众	张仲良 (6)
西路军在河西的浴血苦战	
..... 青海民族学院政史系中共党史教研组 (11)	
身陷囹圄心向党	
——记张琴秋同志在西宁	
..... 青海民族学院政史系中共党史教研组 (33)	
红军长征经果洛	陈秉渊 (38)
国民党派系在青海的斗争	薛文波 (45)
三青团青海支团部第二次改选中的内幕	
..... 李希涛 (60)	
我所知道的马续援	陈邦彦 (63)
马步芳挑拨民族关系和镇压哈萨克族牧民见闻	
..... 蒲涵文遗稿 (69)	
新疆回族团的组成与解体	毓福寿 (72)
记班禅第九世离藏与返藏	宋之枢 (75)
从藏文翻译说到青海藏文研究社	吴 均 (80)
塔尔寺的建筑及建筑艺术	陈梅鹤 (86)
青海蒙、藏族寺院的宗教艺术	方之南 (92)
解放前青海省卫生事业概况	张 琪 (95)

热爱青海 建设青海

廖 汉 生

三十年前，我有幸参加了解放青海的战斗，并在青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这庆祝青海解放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当年那和战友们一起挺进西宁、开辟青海工作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一九四九年，我西北野战军雄师数十万，配合全国各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长驱西进，八月二十六日，攻占兰州，歼灭马步芳匪军主力，为解放青海创造了有利条件。九月五日，我军胜利解放西宁，摧毁了马家封建军事集团对青海各族人民的血腥统治。从此，青海各族人民永远结束了被奴役被剥削的悲惨命运，结束了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获得了新生。

从清朝末年到解放前夕，青海各族人民一直在马家封建军事集团统治之下。从马海晏到马麒、马麟，从马步青、马步芳到马继援，父传子，子传孙，一代比一代凶狠残暴。他们为了世代统治青海，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大力扩张军事实力，大肆搜刮民财，以超经济掠夺的手段，对青海各族人民进行极其残酷的压榨，弄得青海百业凋零，民不聊生，人口锐减。用马步芳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官是从血里捞出来的。”偌大一个青海，那么丰富的资源，工业几乎等于零。在首府西宁也只是有皮革、火柴、肥皂等八个小作坊。农牧业也处于破产的境地，一九四九年的牲畜头数，竟然比一九三七年还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以上。一九三五年，散居于青海境内的哈萨克族有三万七千余人，几经马家匪军屠杀，到解放初期仅剩一千一百多人。

马家匪军是青海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也是人民军队的死对头。它堵截我长征北上的红军，疯狂进攻我四方面军的西路军，残杀我红军战士，使西路军遭受重大损失。在抗日战争中，马步芳匪军听从其主子蒋介石的旨意，屡次进犯我根据地。在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下，马步芳还做着“西北王”的迷梦，节节顽抗，垂死挣扎。马家封建军事集团被摧毁了，青海各族人民新生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各族人民就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政权，逐年建立了州县的民族区域自治，当家作了主，安定了社会秩序，加强了民族团结，实现了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在青海这样一个地广人稀、少数民族聚居、交通闭塞、工农业生产比较落后的地区，为什么能够前进的这么快？其根本原因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受到了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得到贯彻执行，重要的原因是有一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

由于马家匪军长期严格的控制和镇压，青海在解放前除了一些自发的反对蒋马匪帮反动统治的斗争以外，没有一个地下党的组织，因而缺乏大批干部，特别是缺乏当地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同时，由于马家匪军的种族灭绝政策和反动宣传、挑拨离间，民族之间裂痕很深，群众对党和政府不够了解，存有不少疑虑。为了尽快地开辟工作，改变青海的面貌，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部队除了担负一部分工作队任务以外，选调了大批优秀干部到地方工作，并抽了一些军、师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团政委、政治处主任和军、师机关的处、科长，到省级机关工作，到各县担任县委书记。这些同志到地方以后，在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以平等态度对待各族人民，在作好上层代表人物工作的同时，深入青海各个角落，草地牧区，和各族人民吃住在一起，进行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

策，建立各级政权，开展清匪反霸斗争。他们和部队广大指战员一起，贯彻积极剿匪和剿抚兼施的方针，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战胜种种困难，依靠各族群众，在冰天雪地和渺无人烟的草地丛林中连续追剿土匪，先后扑灭了马英、韩海如等在大通及湟中地区的骚乱；扑灭了马忠义、马成贤等在化隆、循化地区的骚乱；歼灭了马中福、马希统、杂金牙、马福旺、马德山、高虎成、冶青祥等残匪。不到一年时间，青海境内大股土匪基本肃清，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他们深入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海南、海西、海北，在藏族、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土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耐心细致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依靠广大贫苦牧民，团结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打击反动的叛乱分子，实行民主改革。部队住在回族区，不进清真寺；住在藏族区，不进喇嘛庙。为了尊重回族的风俗，部队通过回民区的时候，炊事班把盛过猪油的油桶、锅、碗、瓢、勺，用火烤过，用水煮过，直到闻不到一点油腥味，有的连队把来不及吃完的猪肉挖坑埋掉。回族群众高兴地说：“从古至今，只有共产党才尊重我们的信仰，保护我们的清真寺，把我们回民当人看待。”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全面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各级自治机构。他们采用各种办法，选拔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从省到自治州以下各级政权机构，都有少数民族干部担任领导工作，充分发挥了各族人民在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上当家作主的积极性。青海的工农牧业生产也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除恢复改建原有的少数工矿企业以外，新建了不少工矿企业。柴达木的原油源源外流，祁连山的丰富宝藏得到了开发。为了改变青海交通闭塞的状况，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鄂拉山、长石头山、大坂山，在人烟稀少、荒凉偏僻、空气稀薄、瘴气逼人的地区，修通了青康、青张公路，活跃了城乡物资交流。他们关心各族人民生活，发放贷款，扶植农牧业

和副业生产，帮助长期流落在甘、青、新边境地区以野牲、草根为生的哈萨克族人民安家定居下来，改善了长期与外界隔绝的果洛藏族人民的处境，使青海少数民族群众享受到祖国各族人民大家庭的温暖。

在建设新青海的斗争中，从部队到地方的这些干部，也得到了锻炼提高。他们热爱青海，扎根青海，成了青海各级政权机构和各条战线的骨干，朝气蓬勃地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受到了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青海的代理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斗争矛头首先指向了这批在解放和开辟青海的工作中建立了功劳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残酷镇压革命干部，不少和青海各族人民有血肉联系的优秀干部被打下了台，靠了边，长期失去为青海人民服务的机会，有的还关进了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由于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青海代理人的干扰破坏，兴风作浪，青海长期得不到安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了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遭到了践踏，正在发展起来的工农牧业生产停滞不前，人民生活遭到了很大困难。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也挽救了青海。经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青海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和平反昭雪，一些长期靠边站的干部又回到了各级领导岗位，获得了重新为党为国家为青海人民工作的机会。这些同志熟悉青海的情况，了解青海的特点，与青海各族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建设青海的得力骨干。

这些同志深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深知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危害，也就应该更深切地体会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不少同志身上同样会有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同样会有一些精神枷锁。因此，同样有必

要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正确地总结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青海建设的新情况，从青海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青海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才能加快青海建设的步伐。这些同志在开辟青海工作的过程中，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为群众着想，因而受到了青海各族人民的拥护。然而，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受到很大破坏。这种影响，在这些干部身上同样会有表现。党风不正，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充分调动起来。端正党风，是全党的事，而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事。领导干部的作风正了，才能扶正压邪，形成一个好的风气。因此，希望这些同志象当年解放和开辟青海工作时那样，在省委的领导下，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处处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利益，和群众同甘共苦，进一步贯彻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以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群众，投入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斗争中去。

青海素有“黄金青海”之称，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建设现代化的新青海是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在这庆祝青海解放三十周年的日子里，祝愿青海各族人民群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指引下，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把青海的丰富宝藏发掘出来，为青海各族人民造福，为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本稿是作者为纪念青海解放三十周年而写的专稿，原载《青海日报》，本刊为了保存史料，特予刊登。）

重团结，讲政策，深深扎根于群众

张 仲 良

在热烈庆祝青海解放三十周年的时候，《青海日报》社的同志要我写一点感想。这使我回想起解放初期，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依靠青海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的努力，重团结，讲政策，使党的工作在青海各族人民群众中深深扎根的情景。那些艰苦的岁月，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特别是广大干部团结各族人民一道战斗，克服了重重困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一直深深的留在我的记忆中。弹指之间，三十年过去了。至今我还很怀念祖国边陲的青海大地，更怀念同我一起在那里工作过的战友和同志。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对青海各族人民三十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达我由衷高兴的心情。

解放前的青海，乌云遮日，阴霾满天。马步芳匪帮多年盘踞青海，实行封建割据，遍设关卡，对外严密封锁。这个“土皇帝”对青海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反动统治，一方面进行血腥镇压，用“挖心剖腹”等最野蛮的手段屠杀人民，如对果洛藏族人民就有过七次大屠杀，一次就杀害玉树白日麦玛部落七百人；另一方面，则大肆推行“不准汉民读书、不准回民闲转、不准藏民有刀枪”的分别对待的反动统治政策。他还竭力挑拨离间，蓄意制造纠纷，煽动民族和部落之间互相残杀，借以维持其反动统治。他所经营的官僚资本“德兴海”商行，在经济上巧取豪夺。致使各族人民之间的隔阂很深，经常发生械斗流血，再加上自然灾害频仍，各种疾病流行，牲畜死亡，人口减少，青海便长期处

于非常落后的悲惨境地。青海各族人民遭受的苦难，是较内地更加深重的。

一九四九年，形势急转直下，全国胜利在望。由王震同志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为了拯救青海各族人民，于九月三日乘胜进军青海，五日解放了西宁，至十月二十日，除一部分边远牧区外，青海全境已获得解放，从此结束了马步芳匪帮的反动统治，为各族人民开创了无限的光明前景。但是当马步芳匪帮的主力在兰州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以后，在他们仓皇逃离西宁之前，曾指使其残留的匪徒在大通县桥头开会，作了“战马变耕马、枪枝埋地下、分散隐蔽、待机而起”的应变部署。他们凭借其反动的社会基础，利用历史上造成的各民族之间互相仇恨的状况，造谣惑众，不断叛乱，猖狂反扑，作垂死挣扎，妄图在我立脚未稳之时，将我赶走。由此可见，解放初期在青海，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势力依然在作拼死的斗争。要巩固青海解放的伟大胜利成果，还必须继续努力作战！

西宁解放后，由廖汉生、贺炳炎同志率领的一军驻守青海。最初省委领导成员只有我和廖汉生、张国声等同志，后来西北局从各地给青海陆续调来一批领导骨干，充实了党政机关。为了加强各级党委和基层政权建设，当时还从部队抽调一大批优秀指战员，担任县委书记、县长以至警卫战士等，配套派到地方的各个农业区和牧区，去健全和建立政权，追剿残匪，开展群众工作。这样，有了领导班子，有了干部，就可以运用团结的力量，发挥政策的威力，比较快地打开工作局面。但解放前我们党在青海没有地下组织，我们对青海社会情况缺乏了解，一切都要从新开始。当时西宁的社会秩序又很不安定，匪特时常骚动，夜间不断传来枪声。我们的工作条件很差，遇到的困难很多。在新解放区的艰苦环境中，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始终坚守战斗岗位，精神振奋，团结一致。他们个个识大体，顾大局，以苦为乐，以革命利益为重，誓

为建设一个新青海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对青海解放初期的工作极为关怀，对加强民族团结和正确执行民族政策，作过很多宝贵的指示。我们坚持从青海多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努力把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内容与青海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当时有个别同志只从主观想象出发，急于求成，企图一铲子下去把所有的脏东西铲光。有的搬运汉族地区的工作经验和方法，效果不好，损害了民族团结。为此，省委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月发出《关于当前几个问题的决定》，这是省委下达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决定》明确指出：“任何工作都是民族与阶级问题之交错，从决定方针到执行的每个工作环节，都要细心地多方面考虑，从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以恰当的方法结合民族特点”，“一切问题，都要服从民族团结，大力做到停止互斗，减少纠纷”。强调指出：“目前唯一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团结各民族人民，开展广泛的清匪肃特运动，这一步做好以后才可能有步骤的分别进行其他改革工作。”《决定》还要求青海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一定要下定决心，积极摸索和学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方法，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实践证明，这样做符合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又切合青海的实际情况，从而纠正了某些生搬硬套的错误做法，十分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推动青海工作的前进。

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民族统战工作，注意做好各少数民族中与人民有联系的上层人士的工作。因为这些头面人物，在本民族中有较大的影响，在当时的条件下，做好了他们的工作，就大大便于做好群众工作。许多重要问题，我们先与各民族的上层人士协商，做到各民族都满意。如有争执，则耐心做工作，甚至作出必要的妥协。当时为了平息叛乱，稳定大局，各级领导同志都亲自做上层人物的工作，向他们阐明政策，晓以大义。因为解放初期出现的每一起反革命叛乱，几乎都是由

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挑拨煽动，个别上层人物首先上当受骗，而使敌人的阴谋部分得逞。对此，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动群众，坚决揭露敌人，惩办反革命，并对上层人物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组织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开阔眼界，提高了他们对各民族团结重要性的认识，团结了大多数，孤立了少数顽固分子，粉碎了敌人的种种阴谋破坏活动。

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指示我们：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我们在青海站住了脚，就坚决遵照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把筹备、推行区域自治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如同人体有了健全的骨骼才能站起来一样，各少数民族有了自己民族的革命骨干，才能保证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物质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集中人力、财力举办以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为主的干部学校，各部门都有计划地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截止一九五三年底，仅牧区即培养出少数民族干部一千七百九十六人，占牧区干部总数百分之三十以上。一九五三年以后，建立了玉树、海南、海北、海西、黄南、果洛等六个相当于专区一级的民族自治政权，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这是我们实践毛主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和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所取得的可喜成绩。同时，我们还一再教育汉族的同志，克服大民族主义的思想，向各少数民族学习，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做团结的模范。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注意用经济手段，不断调整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迫切要求改善经济文化生活。我们工作根本的出发点，是着眼于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改变青海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青海刚刚解放，党和政府就十分关心各族人民的疾苦，积极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扩大民族贸易，开展疾病防治工作。群众对实行公平交易，同声称赞。解放前一百斤羊毛只能换一块半砖茶，一九五

〇年可以换到十二块砖茶，大大鼓舞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热情。在农业区经过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使粮食产量有大幅度增长；在牧区由于实行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与“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使畜牧业生产得到了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青海解放初期，敌人企图利用复杂的民族矛盾把我们赶走，那完全是痴心妄想。正如一九五一年八月青海省第二次党代会议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已经实现了在农业区生根，在牧区站稳脚的要求。敌人的捣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再想利用民族关系进行挑拨离间，兴风作浪，是不可能的了。青海各族人民实现了空前未有的民族大团结，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以及西北局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和广大党员干部、驻军指战员的一致努力下，青海解放的最初几年，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只是一个序幕，或者说是一个开端。我已经调离青海多年，但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远方来客，对青海的建设成就和工作中的新鲜经验，仍时有所闻。三十年来，青海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令人非常鼓舞。我坚信，青海各族人民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的方针，进一步发扬革命传统，加强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奔向四个现代化，一定會在青海这块辽阔富饶的土地上，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夺取新的胜利。

（本稿系作者为纪念青海解放三十周年而写的专稿，刊载于《青海日报》，本刊为保存史料，特予刊登。）

西路军在河西的浴血苦战

青海民族学院政史系中共党史研究组

（一）张国焘路线在河西的最后破产

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五万人左右在甘肃省的会宁会师，其中红四方面军占三万余人。这五万名红军指战员是在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历经长征中的千难万险保存下来的革命精华，是即将爆发的抗日民族战争的骨干力量。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给了全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毛主席、党中央计划组织一次静（宁）会（宁）战役，夹击消灭西（安）兰（州）公路一带的蒋介石军队。当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领导的二方面军已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并围击凤县，拖住了胡宗南部；一方面军由聂荣臻、左权同志领导的西征军已在静会地区将毛炳文、许克祥部包围起来。中央通知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协同聚歼。但张国焘违抗命令，擅自带领部队向西退却，又一次破坏了中央计划。后因部队指战员不满，而且渡河困难，只好将部队拉回。但张国焘贼心不改，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分析，使他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而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完全丧失了我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陕西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加之他长期形成的军阀主义野心，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另搞一块地盘称王称霸。因此当他西逃青海西宁的诡计未成之时，又假传中央指示，命令他所带领的四军、五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西渡黄河，妄图在河西搞一块地盘，与党中央分庭抗礼。十月二十五日夜，作为前卫部队的三十军，一鼓突破了

马步青所属骑五师韩起录旅的河防部队，在甘肃靖远县虎豹口（今河包口）渡过了黄河，第二日、第三日，五军和九军也渡过了黄河。正当四军和三十一军准备过河时，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赶来控制了渡口，截断了西去的道路，张国焘（未过黄河）才只得作罢。渡过黄河的三个军，在张国焘的得力助手陈昌浩的主持下组成了西路军，共二万五千余人，由陈昌浩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任军政委员会付主席兼总指挥，王树声任付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下属三个军：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松海，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三十军。代理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煥。

毛主席和党中央得悉张国焘令三个军西渡黄河，陷入绝境，立即派刘伯承同志率领红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与二十八军^①，在镇原组织援西军，准备把过河部队接回来。但陈昌浩违抗命令，往西越走越远。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十二月中旬和一九三七年二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曾三次集体决定回师陕北，并已将命令下达各军，但都被陈昌浩否定，致使援西军的计划无法实现，我西路军被张国焘的罪恶路线投入到无法挽救的困境，大多数指战员牺牲在河西走廊。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西路军渡过黄河后，蒋介石急忙迭次电令马步青、马步芳堵截。马步青遂派伪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为前敌总指挥，堵截过河的红军。马步芳为扩充部队，将青海全省扩编为十五个保安区，各县成立壮丁司令部，委任各区保安正、副司令，就地征拔十七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丁，自备枪械、鞍马，强令入伍，各区保安团丁共达十万人左右。并派伪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二

^①中央到达陕北后，将陕北各军游击队和地方部队合编为红二十八军，刘志丹同志为军长。